

非洲史(十四)

孙颖 主编

目 录

非洲现代史 (续)	1
非洲独立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 (续)	1
战后非洲社会发展状况	21
酋长地位和作用	21
非洲黑人资产阶级	32
非洲本土资产阶级的特色	40
非洲工人阶级	47
非洲人口的急剧增长	56
非洲城市化问题	63
非洲妇女问题	73
非洲各国之间的关系	76
联合反帝反霸斗争	76
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85
经济合作成就	90
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100
合作处理难民问题	121
非洲国家对外关系	127

非洲现代史（续）

非洲独立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续）

四、军事政变与军政权

独立前后，非洲国家的军队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是在民族武装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这是非洲新型的军队，其军官多为知识分子、政治工作者转化而来，不少人都到过苏联、中国、埃及、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国的军事院校受过教育，少数人在西方接受过训练，士兵主要是农民。这类军队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战斗力，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津巴布韦等国的军队。坦桑尼亚军队基本上属于此类，因为该国在独立不久解散了原殖民军，另建新军，其建军原则基本与上述国家军队相同或类似。

二是继承殖民地时期的军队，包括警察部队。这类军队一般规模较小。在原英属殖民地，5 万居民中有 1 个士兵；法属地区则超过此数的 2 倍。这主要是因为原宗主国在战后都把重点放在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上，而不重视卫戍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法国还采取独特的集中建立军队的方针，使军队不属于任何殖民地。这些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完全掌握在白人军官的手中。少数中下级军官则从殖民地较发展地区招募，然后送到宗主国的军事院校培训。士兵多从殖民地边远地区一些骁勇善战的部族中招募。

三是独立初期新建的特种部队或警察部队。这类部队属总统卫队，不受陆军管辖和指挥，如恩克鲁玛、凯塔、奥博特等都建有总统卫队。此外，还有少数国家独立时没有军队，独立后为应付外部不测事件而新建，如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等国的军队。

四是独立国家的军队，如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的军队。苏丹军队也基本上属于此类，因为从 1922 年起，它的军队已由本国军官指挥。

战后，殖民当局新建的军队是维持殖民统治的工具。如法属殖民地的军队往往被派往诸如阿尔及利亚、喀麦隆甚至印度支那等地去镇压民族独立斗争。军中的非洲籍中下级军官虽然与文职中下级职员、知识分子等的出身、经历和处境大致相同，但除极少数外，多数均很难参加到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中去。在独立初期，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在少数国家里还成了破坏因素。

不少国家当权派都把建立本国军队作为与过去耻辱历史决裂的关键因素和主权的象征，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些领导人民进行过武装斗争的政党和组织，执政后都把过去的游击队改为正规军，并建立了强大的民兵组织。其他多数国家则把过去的军队加以改造或重新建立新军，以使军队成为政权的支柱。它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通过本地化或非洲化，从白人手中接管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其次，改变过去从发达地区招募军官、从边远地区和能征善战的骁勇部族中招募士兵的办法，从全民中招募。但是，非洲军队的装备、培训和管理仍然依赖外国。法兰西共同体的某些国家通过与法国签订军事合作协定，由法国提供军援和保护，其中有五

个国家迄今仍有法国驻军和法国的军事基地。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当权派都视军队为“宠儿”而关怀备至，尽量满足其特殊利益和要求，有些还允许军方代表参与政治活动。军队逐渐获得了政治地位，关心政治和参政议政的意识在提高和增强，并同社会各方、上至中央下到基层的各界人士都有接触，从而使军队不仅仅是守卫国门的力量，而且成为具有一定威慑性的潜在的政治力量。

非洲军队干预政治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军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从传统意义上说，在非洲，军队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参战或参加部队被视为光荣的事业。军队相对说来超越了地区和部落的界线，而政党则主要以地区部落为基础。军队有较严密的组织和纪律，且有枪杆子，而政党则是分裂的，且无枪杆子。正如美国名记者苏贝格所说：“在不发达的国家里，要达到政治目的，武器往往比选票更有保证，谁掌握了坦克和飞机，谁就控制了国家。”

非洲社会内部也为军队干预政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条件。由于一些国家的当权派长期以权谋私，并把贪污受贿作为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经济一团糟，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人民生活无保障。群众由不满和失望而发展成为罢工、罢课或宗教骚乱，甚至爆发内战。当权派无能力控制局势时，军队就可能主动出面干预或起事（如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及贝宁等国），或是群众运动把军队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如刚果恩古瓦比军官集团和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军官集团），军官集团就会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收拾残局，出掌政权。一些国家当权派

内部的派系斗争难以调和，也迫使执政党掌权派利用和支持军队举事以打击和压倒对方。而当军队本身的特殊利益（包括军队装备、军饷）受到威胁或得不到满足时，或当权派与军官集团某个领导不和甚至反目时，军官集团某一派也可能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把对方打倒，以保全和发展自己。还有些国家的军官集团推翻了腐败政权以后，由于靠暴力进行统治，又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掌权后聚敛财富，扩大国防费用，提高士兵待遇，挤掉经济发展资金，人民生活无改善可言；或者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政见分歧，军官集团由比较团结一致转变为失去中心而倾轧不已。上述种种都使军官集团由政变者变成政变的受害者或牺牲者。此外，外国势力为争夺非洲也常策动政变和反政变。

军事政变几乎成了非洲国家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1960年代下半期，平均每年发生3—4次；1970年代平均2—3次，1980年代前半期平均为3.5次。非洲独立国家总共发生过70多次成功的政变和无数的未遂政变。有的国家甚至时断时续地发生政变与反政变，如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政变的外部因素较多；这个时期之后，内部因素变为主要原因。有的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也有的政变推翻了军政府。

在52个非洲独立国家中，建立过军政权的国家占半数以上，迄今仍有8个国家实行军人统治，它们是毛里塔尼亚、苏丹、尼日利亚、几内亚、加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莱索托。这些军政权都是1980年代建立的。历史最长的是加纳罗林斯军政权，于1982年1月建立；历史最短的是1989年6月建立的苏丹巴希尔军政权。

军官集团举事成功后，都成立了名称不同的军事委

员会（革命指导委员会、复兴委员会、民族解放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等等，以下简称军委会），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废除宪法，中止或停止议会和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对于前当权派的首脑，或处以极刑，或长期监禁，或驱逐出境；接着，通过法令确认军委会为国家的权力机构。如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1965年6月19日举事成功后，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军委会，7月10日公布法令，规定军委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政府机构都在它的管辖下进行活动。

军委会一般都包括政变的核心人物及有功之臣，最少的仅5人，最多的100多人（如埃塞俄比亚），一般的25—30人之间。军委会主席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或统帅，有的还兼任国防部长。

根据军官集团的背景、组织程度以及政治倾向性，军委会所起的作用各异。一般地说，军官集团越团结，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军委会的支撑能力、应变能力就越强，就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有的政变在举事前酝酿的时间较长，并建立起全国秘密或半秘密的军官组织，组织比较严密，如埃及、利比亚、一定程度上的埃塞俄比亚。以埃及为例，如果从自由军官组织萌芽算起，这个过程历时14年；若从自由军官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算起，也经历了4年有余。利比亚的卡扎菲完全仿效埃及的做法，也获得了成功。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协调委员会在举事前基本上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另一类军官组织虽被群众运动推向前沿阵地，但军官集团本身也有秘密组织，军政权因而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述这类国家的军人集团不仅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在掌权后切实地为人民做

了一些好事，进行了比较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国有化、土地改革，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从而把社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另一些军官集团在举事前无充分准备，或先发制人以保全自己，或被外国政变成功所吸引而仓促举事，最普遍的还是由于当权派的腐败而举事。这类军官集团组织不如前一类严密，军政权的支撑能力和应变能力均较弱，从而导致国家局势严重动荡，政变和反政变层出不穷，文官政府和军政权不断交替。

以苏丹为例，1956年独立后，北方的阿拉伯人掌权，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这引起南方黑人的不满，他们要求分离，致使苏丹陷入了长期的、时断时续的内战。历届政府都派军队前去围剿或举行谈判，均未奏效。与此同时，北方各穆斯林教派、各种势力、包括文官和武官之间矛盾复杂、尖锐、政局动荡不已，军政权、多党制、一党制不断交替，形成政权更迭频繁的格局。第一届多党制政府（1956—1958年）以民族联合党（哈米特亚教派）为主体，乌玛党（安萨尔教派）和人民民主党（由民族联合党分裂出来的）参加。由于经济恶化，社会动荡，权力转移到以易卜拉欣·阿布德为首的军官集团手中（1958—1964年）。同样由于经济原因以及军政权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政策，导致全国大规模反对军政权运动，军政权垮台，无党派人士和各政党联合组成过渡政府。1965年4月，北方六省举行立法会议选举，建立起乌玛党与民族联合党联合执政的政权。1969年5月25日，以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为首的青年军官集团发动革命，组成革命指导委员会和内阁，改名为苏丹民

主共和国，取消一切政党。1971 年进行总统选举，建立议会，制定永久宪法，尼迈里任总统兼总理。1972 年建立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正式建立一党制政权。1985 年 4 月，苏瓦尔·达哈卜发动政变，成立过渡军委会，26 日成立临时文官过渡政府，50 多个政党相继取得合法地位。1986 年 4 月举行议会选举，建立起以乌玛党为主体、民族联合党次之、全国伊斯兰阵线和共产党均参加的多党制政权。1989 年 6 月，奥马尔·巴希尔在以哈桑·图拉比为首的全国伊斯兰阵线（原教旨主义）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以建立伊斯兰教国为目标。目前反对党派虽已被禁，但其推翻军政府的活动一直未间断。迄今南、北方之间的战争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中，南北问题是现政权面临的最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巴希尔军政权能维持多久，尚难预料。

尼日利亚政局的发展与苏丹类似，其不同点是，军人统治的时间较文官长两倍以上。自奥卢塞贡·奥桑巴乔为首的军政权（1976—1979 年）建立以来，历届军政府都打着还政于民的旗号。奥桑巴乔军政权在其执政期间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它执行民族和睦与和解政策，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特别是重视农业的发展，逐步改变经济发展单纯依靠石油的格局。为了还政于民，军政府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于 1979 年中召开制宪会议，解除党禁，通过了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新宪法。同年 8 月举行大选，尼日利亚民族党获胜，沙加里当选为总统。10 月 1 日恢复了文官统治，被称为第二共和国。奥桑巴乔及少数高级军官辞职，军队完全回到兵营，从而成为军人向文官顺利移交权力的范例。

由此可以看出，军政权也和文官统治一样，有比较

激进的和比较温和的之分。总的说来，它们在维护民族独立、至少在维持短期稳定政局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们是借暴力维持统治，且缺乏治国理财的本领和经验，军政权的临时性和过渡性就更加突出了。一般比较明智的军队领导人不仅把还政于民作为举事旗号，而且也作为其施政纲领的组成部分。加纳的罗林斯军政权基本上也属于此类。

五、非洲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冲击，自 1988 年底、特别是 1990 年以来，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猛烈冲击着非洲大陆。从西非的贝宁到东非的莫桑比克，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南端的南非，从幅员辽阔的尼日利亚到弹丸之地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结束一党制和军政权、开放民主、引进多党制、尊重人权的政治运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民众还要求经济自由化，并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来对付贪污腐败。因此，多党制成为政权建设现阶段的一股巨流。目前已有 30 多个国家（包括 3/4 以上的人口）走上或即将走上多党民主制建设的轨道。这一浪潮还在发展，几乎每天都有事件发生。非洲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易变期，人民还将遭受更多的苦难和折磨，但也不排除少数国家可能会向着由乱到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某些政治家在经历这次浪潮的冲击后，可能会在进一步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政权模式和发展道路。

非洲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始于 1988 年底，先是阿尔及利亚，尔后扩及到西非，最后冲击到非洲大陆各个角落。参加者主要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中下级官员、

自由职业者、学生及青年失业者，有些国家还有军人或少许高级官员。运动的目标是反对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要求改善或至少能保持原生活水平不致下降。运动后来因反对党派的推波助澜而迅速转变为政治斗争，即执政党与反对党派夺权与反夺权、分权与反分权的斗争。浪潮来势之猛、时间之长、冲击政府的合法性之广泛，是1960年代独立以来空前未有的现象。一批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享有极高威望的、甚至被神化了的领导人，几乎已成了人们回忆中的人物。1990年出席第二十六届非统首脑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有8位未出席1991年第二十七届非统首脑会议。这也是1963年非统成立以来罕见的事例。仅最近一两年间，就有10位总统下台。这表明，非洲正进入一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阶段。

截至目前为止，非洲政权更迭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靠枪杆子夺权。这类情况多发生在内战的国家，即武装反对派已兵临城下，或者武装反对派兵临城下与城内民主化浪潮内外夹击，实现政权更迭。如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索马里西亚德、乍得哈布雷以及马里特拉奥雷等政权的垮台。

二是贝宁模式，又被称为“文官政变”。所谓贝宁模式，就是在1990年2月以贝宁总统克雷库为首的人民革命党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由法国出谋划策，通过召开有反对党派参加的全国会议，并由反对党派选出一名政府首脑主持临时内阁，负责筹备立法和全国大选事宜，然后由选举产生最高权力机构、总统和正式内阁。在整个过程中，全国会议是关键。由于反对党派在推翻原政权或要求分享权力方面目标一致，且在会议中票数占压

倒多数，又有社会上民主化浪潮的依托，它们对原当权派都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从而比较顺利地夺权。这种模式始于贝宁，目前还在延伸和扩大，也备受西方的支持和鼓励。如贝宁总统索格洛 1991 年访美，礼遇甚高，布什亲自接见，并赞扬索格洛是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允诺向贝宁增加援助，其金额已从 1990 年的 200 万增至 800 万美元，另外还提供 750 万美元作为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之用，答应在今后五年内提供援款 5700 万美元。布什还呼吁如扎伊尔、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学习贝宁的榜样。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都采用贝宁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刚果、尼日尔、马达加斯加等国已通过全国会议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移，反对派推举出来的代表担任了过渡时期的总理，掌握了实权。多哥虽已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移，但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由于临时政府首脑约瑟夫·科菲戈欲夺取总统全部权力，并禁止原执政党的活动，军官集团出面干预，导致了总统、军官集团及临时过渡政府三方就分权问题重开谈判，科菲戈不得不作出让步，重新改组政府，权力已大不如前。刚果军队也反叛总理安德烈·朱隆戈，但他幸存下来了。扎伊尔蒙博托总统与反对派关于分权问题斗争激烈。蒙博托竭尽全力分裂反对党派，鼓励它们成立自己的政党，仅临时过渡政府就已进行了三次改组，对社会上反对他的游行示威进行镇压。后在塞内加尔斡旋下，双方达成初步和解，任命了新总理。喀麦隆执政党已与反对党派就召开全国会议达成了协议。

三是通过选举实现政体改革，这类国家也各有不同情况。

通过选举原执政党仍继续执政的国家，例如突尼斯、加蓬、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布基拉法索及毛里塔尼亚等国，受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被迫进行某些政策的调整。

通过选举，执政党败北、反对党上台执政的，有贝宁、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赞比亚等国。阿尔及利亚原执政党民阵在地方选举及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均告失败，伊斯兰救国阵线获大胜，上台执政的格局已定。但由于军队出面干预，原总统沙德立被迫辞职，中止第二轮选举，阻止了伊阵上台。

已决定引进多党制、并确定了选举时间的国家，有马里、安哥拉、布隆迪和肯尼亚等国。除安哥拉外，其他几国都一次或两次推迟了选举日期。未确定选举日期的，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莫桑比克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同武装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或和平协定。几内亚比绍也开始实行多党制。

规定了民主化的框架，使多党制政权能在有秩序的和平环境中妥善地建立起来，这类国家有坦桑尼亚。军政权更是如此。尼日利亚军政权相当成功地控制了国家政局，宣布实行两党制，一个党是中左派，另一个党是右派，政府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及其他方便条件，目前两党已形成，总统选举预定在 1992 年 8 月举行，而大选则在 12 月。几内亚军政权与该国类似。加纳罗林斯军政权提出了还政于民、建立多党制政权等一整套计划步骤。目前它已成立了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对新宪法举行公民投票，同时提出在全国协商会议召开前保持党禁。

非洲民主化浪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国际大气候的直接产物。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东风劲吹”的剧变的国际形势中先后取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两面大旗一直在非洲的上空飘扬。非洲国家无论是以社会主义，还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都在政治上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一党制或军政权，在经济上建立起比较严格的集中管理体制。这样的政权体制，在部族分裂、经济落后、西方特别是宗主国为保护其传统权益不断施压和破坏等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必需的，也有利于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

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没有或完全没有摆脱部族主义、地方主义的痕迹，它们大多凭借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力量，实行对人民和对其他部族的统治。政权的改变和领导人的频繁更迭，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上层人物或精英玩弄“抢座位的游戏”，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制度的变革。政权腐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加上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如严重的对外依赖、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重视不够、人口增长率过高以及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而造成的贫民阶层和失业群等等，导致了1980年代的生存危机和经济危机。1980年代政策调整又大大超过了人民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人民生活降至独立时，甚至低于独立前的水平。非洲有600万难民，还有数千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城市居民特别是工资收入者再也不能容忍那些侵吞公款、把赃物藏匿在外国银行的统治者，也不能容忍那些总是迫使政府无休止地借款的外国人。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发泄不满和怨恨，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权者。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对国家疲惫不堪、专制腐败以及当权者对人民的种种承诺不兑现而产生的厌烦、愤懑和绝望情绪发展的必

然结果，当然也有反对党派的利用和推波助澜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1960 年代以来，为争夺非洲，美苏两霸都争先恐后地向非洲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以求非洲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使非洲生存活动余地较大，极少数国家甚至借助冷战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

冷战结束、东欧形势剧变、苏联解体，不仅加速了非洲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传播和实施的进程，而且由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使非洲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美国对非洲由过去阻遏、破坏苏联扩张为目的的政策转变为把非洲纳入其国际新秩序，即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而稳定的新世界的轨道。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日益加紧强化强权政治，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非洲，把推翻集权或独裁统治者作为国策，粗暴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美国建立数千万美元的促进民主化基金以支持各国的反对派），并把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紧紧卡住非洲国家当权派的脖子。绝大多数当权派只能在唯命是从和被抛弃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扎伊尔原是美苏两霸争夺的大块肥肉，又是称霸非洲的关键地区之一。它独立伊始，美国就实行鲸吞扎伊尔的政策。第一届政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杀害后，蒙博托一直被视为执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非政策的中心人物。美国先后提供 30 多亿美元的援助（不包括军火援助）。美、法、比三国至少三次配合行动，派兵前往扎伊尔帮助维持社会和法律秩序，稳定政局。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蒙博托政权日益冷淡。在 1991 年 9—10 月间军民抢劫、社会动乱危及到蒙博托政权的统治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公开谴责扎伊尔政治腐败、专制独裁，要蒙

博托下台。科恩说：“蒙博托应从过去摆脱出来，让一个来自反对党派的人担任总理，以管理国家政治和经济事务，特别要对蒙博托的经济状况实行监督。”法、比等国不仅中断了对扎伊尔的经济援助、军事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还以护侨、撤侨为名，派兵占领扎港口、机场、逼蒙博托让权。

肯尼亚一贯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经济发展较好，政局长期保持相对的稳定，被誉为非洲的“橱窗”和“样板。”美国原先一直把莫伊总统视为“最可靠的盟友。”。肯尼亚每年从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处获得约 10 亿美元的援助。但冷战结束后，美借口莫伊政权缺乏民主、贪污腐败，特别是不满意莫伊坚持一党制，向肯尼亚施压日甚一日，由一般指责发展到公开支持和援助反对党派，由要挟减少援助发展到停止援助，由美国定调发展到西方集体谴责和停止援助。西欧共同体已通过决议，暂时停援为期 6 个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1992 年 2 月 22 日称，“捐助者们以前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强硬过，提出的条件政治性也没有这么强。”在这种情况下，莫伊政府被迫接受向多党制转变，否则失去 10 亿美元的外援，其经济就可能运转不灵甚至破产。

西方对肯尼亚、扎伊尔的政策是向全非所有国家发出的信息。据悉，欧共体已告诫马拉维总统卡穆祖·班达，如果他不能满足它们期望的东西，捐赠国可能会像对待肯尼亚那样对待他的国家。英国已削减了对马拉维的援助，由 1000 万英镑减少到 500 万英镑，以抗议班达政权忽视人权和容忍政府挥霍国家财产的行为。

非洲当前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既与非洲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相吻合，又有西方特别是美国

再次在非洲推行殖民化的战略图谋。在不少国家里，后者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虽然使非洲获得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但对非洲的挑战却是严峻的，非洲的主权受到巨大的威胁。

非洲的民主化浪潮预示着非洲正在经历一次变革。民主化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内部的一种民主气氛，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制腐朽的统治，对新老当权派都起着某种监督和遏制的作用。为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当权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所属政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增加执政党与人民、执政党与反对党派之间对话的渠道，并通过立法手段进一步保证人民的权利以及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不少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原执政党通过选举继续执政的国家，虽然仍保留了原来的政治格局，但却根据目前形势进行了自我调整，比较务实。例如，突尼斯公布了各政党必须遵守的宪章，并对容易引起国内动乱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和组织采取绝对禁止的政策。乌干达抵抗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后，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抵运统治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加上多年人心思定，从而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坦桑尼亚也循序渐进地引进多党制，迄今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但并未引起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社会动乱。

这股浪潮促进了非洲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热点地区开始通过谈判熄灭战火。在南部非洲，南非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正在结束白人少数人统治，向非种族歧视的社会过渡。现政权举行了白人公民投票，并安排了与 20 多个黑人政党有关宪政问题的谈判。安哥拉人运政府与武装反对派安盟于 1991 年 5 月签署了伊什图里尔协